

# 《原道》、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——访杜维明教授

2007-05-19 11:16:00 作者:陈璧生

访问时间：2004年11月11日

访问地点：中山大学哲学系

陈璧生（《原道》编委）：《原道》杂志于1994年由陈明先生创办，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。《原道》是九十年代初国学兴起的产物之一，中国思想界经历了这十年的变化，当初跟《原道》一起的一批刊物例如《学人》等都已经停刊了，但是《原道》还在坚持着，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《原道》在开卷语中说：“如果正大踏步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的中国，其文化确实是一个性格独具，结构完整的系统，那么，它那五千年来一以贯之至今仍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或价值拱心石，究竟是什么？或者说，应该是什么？”《原道》这十年来都在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。对这个问题，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，您是怎么看的？

杜维明教授：基本上可以说，中国文化是一个性格独具，结构完整的系统。中华民族的再生，不仅表现在经济上，政治上，也应该表现在文化上。中国传统的文化信息，必须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，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，来陈述它的希望，它的期待，和它自己的理念。所以现在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“文化的主体性”，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“中国文化本位”是有所不同的，“文化的主体性”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，而是一种自我意识，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，文化的自我意识，我想陈明先生和《原道》也是想在这个方面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。北大的楼宇烈教授也谈这个问题。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，我非常赞同主体性的说法，“主体性”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特点：首先，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，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，企业、媒体、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；其次，它的民间性比较强，不是从上到下；再次，它是发展的，不是说定性之后就变成一个静态的结构，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。最后，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、发展有密切的关系，不是完全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。因为开放，它向西方学习的力量很强，这种学习建立在把自己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吸收，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。这样建立的主体性可以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与反思的能力。我想陈明先生也接受“文化的主体性”这样的观点。

陈璧生：我们检索2004年的中国人文界，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，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，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，第一是蒋庆先生编了一套给儿童的经典读本，这个事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。第二个事情是《甲申文化宣言》的发表，您也是这份宣言的签名者，第三个事情就是《原道》十年，《原道》十年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，十二月我们还要举行一个研讨会。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有一个新的特点，那就是在读经争论中，一大批秉持自由主义理念，以自由主义作为言说资源的知识分子参与到读经争论中，而且他们大多是赞同读经。

杜维明教授：我现在对文化保守主义有自己的观想。最近比如庞朴先生，他公开说，我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。我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，在美国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朋友，他是我的忘年交，叫丹尼·贝尔。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，他说，在经济的领域，我是社会主义者，因为我特别突出分配的重要性，在政治的领域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因为我对人权、法治、自由、平等观念特别强调，在文化上我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，因为我要承继我的文化。他的文化是犹太教。我觉得一般的保守的提法，总是把保守跟激进、和自由分开来，这是基于政治立场的区分方法。但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，不一定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。你不能说马林·布伯，非常重要的讲对话的犹太学者，他认同犹太教，就是保守主义，那不一定。还有一些研究基督教神学的杰出人物，不能因为他们认同基督教就说他们是保守，事实上他们在美国自由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贡献。我们可以把保守的观念理解为一种保存、继承，就像孔子所说的“述而不作”，这种继承的本身又有创造，又有重新的诠释，就是重视文化。有些人根本不重视文化，说我们搞政治搞经济，对文化没有兴趣。

在生态环保上有一个观念，保守叫 *conservatist* 但是生态环境的保存，叫 *conservationist*。我保存，我保护，我发扬，我关心，我关怀。所以我想我们对文化保守，应该有自己的定义。那种认为保守就是不激进，不革命，不自由，这是对文化的政治化曲解。我愿意改革，我愿意革命，不平等的事情我愿意改变。但是我对文化的继承，文化的价值，文化的理念，对传统观念，对文史哲非常重视。我认为文化保守不仅是上层结构的内容，文化保守对人的整个日常生活起非常大的转化、导引作用。

你刚才提到的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倾向文化保守主义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我参加了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论坛，我提了关于自我，关于社会性，主体性和天人合一的观念。在北京有北京论坛，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政府组织的。在这个论坛上，我谈了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所起的作用。《甲申文化宣言》谈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共识，这个宣言的本身比较突出多元，开放，对话。

另外你说到的关于《原道》的开放性，我说现在有一种文化自觉，要寻找文化的主体性，那么我们从事儒学研究，当然希望儒家传统对主体性能够有更多的资源。同时，当然有些从道家的角度，或者大乘佛教，都有可能找到资源。

陈璧生：您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？

杜维明教授：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，真正的第一流的自由主义者甚至革命者，包括像鲁迅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他们对儒家进行严厉的批评，事实上有利于儒家创造新的生命力，开拓新的空间。那些对儒家的真正价值完全没有理解，但是想通过尊孔读经来形成政治控制，对儒家的腐化反而是非常厉害的，例如袁世凯、张宗昌等军阀。有一段时间我看到蒋介石的文化政策，其中有民族主义的因素，但是也有利用儒家作为政治控制的模式。我觉得政治的保守主义甚至是政治反动者，基本上是军阀、袁世凯他们，他们对儒家的杀伤力太大了。以前我说“明枪”和“暗箭”，公开反儒家的是“明枪”，利用儒家进行政治控制的是“暗箭”，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”。

陈璧生：前面我们主要谈儒家与政治的关系，接下来我想向您请教儒学宗教化的问题。现在中国有一部分学者提倡儒学必须宗教化，或者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儒学本来就是一种宗教。甚至有的学者再进一步，走得更远，公开提出儒教应该成为“国教”。

杜维明教授：儒家是不是宗教，或者儒家是不是哲学，这是西方的学科框架中的讨论，因为宗教、哲学都是西方的观点，其标准也是西方的标准。我们从事儒学研究或者认同儒学，西方的学科框架都只是一个参照。一个人从比较哲学或者比较宗教来研究儒学，如果他说儒家绝对不是宗教，我可以肯定他对宗教的定义是来自基督教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，来自僧侣阶层啦，教会啦，凡俗之分啦那一套。如果有人说儒家绝对是宗教，那他也很可能把社会主义运动，甚至存在主义，都视为宗教。这两种倾向，对宗教的定义，一个是很宽，一个是很狭。我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的。

儒家是不是宗教，儒学有没有过成为宗教的时候，这是历史的问题。比如当初康有为要把儒学变为宗教，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影响力，但是在海外的影响非常大，在印度尼西亚，现在儒教的信徒超过一百多万。

陈璧生：印度尼西亚的儒教信徒有一百多万！

杜维明教授：是的！一百多万。所以我到印度尼西亚去，一定得把儒家说成儒教，因为儒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模式。印度尼西亚是宗教国，你没有皈依一个宗教，就不合法，如果不信儒教，就只能信基督教、佛教或者伊斯兰教。否则婚纱礼大典就不能进行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儒教就以传统的方式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，这样儒学基本上就有儒教的功能。我还没去过，但是这是非常严重的大问题。

在香港，也有人确实把儒学当宗教，进行严肃的祭孔大典。

在中国内地的情况比较复杂，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家是儒教，他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角度看，不说儒教是人民的鸦片，最少也是非常封建，非常落伍，是要批判的。有些学者，例如蒋庆、陈明，他们希望儒家成为宗教，这个宗教有教化的一面，但也成为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组织。年轻的像清华大学的唐文明，他也认为儒家一定要成为宗教，成为宗教才有社会影响力。另外像回到清华的世界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林家翘，他跟我提过这个问题，他也希望儒家能够成为一个宗教。将来这个运动有一个倾向，应该是宗教化发展。这个宗教是一个现代宗教，跟一般的传统所了解的宗教不一样，其仪式各方面，或许跟书院有关系，但是一定有它自己的表现形式。

陈璧生：那儒教就跟西方的基督教，犹太教是不同的表现方式了？

杜维明教授：是的，不相同的表现方式。宗教的表现方式非常多，比如佛教的表现方式，禅宗的表现方式与净土宗的表现方式差别就非常大，道教也有自己的表现方式。儒学的发展，如果宗教化，必须有一种新的表现方式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另外，作为一个文化运动，或者作为一个学术传统，我把它分成道统、学统、政统，分别是作为一个基本的核心价值，一个学术传统，或者作为一种实践。在道统的问题上，我不是说在客观上形成一个道统，不符合这个道统的就不是真正的儒家。现在在台湾的儒家讨论，这种斗争非常激

烈。鹅湖学派说这是正统，士林学派说另一个才是正统。这个问题我希望了解，但是基本上不太参与。

但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，或者认同儒家的学者，你就必须清楚自己的思想谱系是什么。这个是个人的哲学思想的自觉，如果你说你没有自己的谱系，那是你对自己的理解不够。比如说哈贝马斯，他的谱系就非常清楚，他的思想就从马克思，经过马克思·韦伯，代表法兰克福学派。对我而言，牟宗三、徐复观、唐君毅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影响，他们又受到熊十力、梁漱溟他们的影响。上溯到历史上，刘宗周、李退溪对我有影响，王阳明、朱熹对我有影响，荀子、孟子对我有影响。但是如果要选择，孟子还是荀子对我了解的儒家的光大更有影响，那我要选孟子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了解、不研究荀子。朱熹象山辩论的时候我比较同情象山，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朱熹，只说我是象山学派就对朱子无所知，那还得了！朱子的影响十几倍大过象山。我说对阳明比较认同，但是李退溪承接的朱子传统，对阳明学做出很多的批判，并且发展出理学气学，所以对此也必须了解、研究。每个人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，应该自己要知道他的思想谱系是什么。这与客观上道统是什么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，一个是自我理解，另一个是我们在进行辩论的时候儒家的道统代表什么。

政统如果严格的说就是政治的合法性的问题。这是更复杂的问题。现在蒋庆非常重视从公羊学发展儒家的政治儒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。但是不能说发展公羊学之外，讲心性的讲其他的都不是儒学。不是那么简单。因为儒学作为一个波澜壮阔的大传统，和基督教一样，中间有多元多样性。它不仅在时间上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，而且是一个多元的文化，有中国的儒学，越南的儒学、日本的儒学、韩国的儒学，其分别太大了。如果以一个狭隘的观念来研究儒学，就非常有问题。现在一些人讲儒学第三期，在他们眼里这第三期发展所有的人物几乎都是中国人，但是我的理解完全不是这样。最近我到日本，九十六岁的冈田武彦过世了，冈田武彦对现代儒学的发展，在日本，在北美，贡献太大了。在国际上，陈荣捷老先生，美国的狄百瑞，都很有贡献。韩国的有一个我们都很少提到的人物，叫李香英，他在六十年代，就在汉城主持召开世界国际学会，讲儒学 and 经济发展。李香英是牟宗三先生很好的朋友，他是北大、东京大学、高丽大学三个大学毕业的。

我希望儒学有第三期发展，第一期是从曲阜到中原，第二期是从中国到东亚，第三期是进入世界。如果有第三期儒学发展的话，我们假如只考虑中国，那是很狭隘的。必须要看到日本、韩国等地的发展，日本、韩国儒学的发展，比中国要远远超前，超前 50 年！因为我们 1949 年到 1979 年没人真正谈儒学。这方面你看冯友兰先生受了多少的苦！在海外很多学者说冯友兰背叛了儒学，但是我对冯友兰，从他的重新诠释儒学到晚年的时候回归横渠四句，其中经历了很复杂的思想历程。这是很复杂的问题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公案。从长远来看，我希望儒学发展应该比较有比较开放的心胸，但是也应该有比较坚定的认同。

陈璧生：您今年被评为“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50 人”之一，您知道这个事情吗？

杜维明教授：有点印象，这是谁评的？

陈璧生：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评的。

杜维明教授：哦，对。杂志、报纸由于不晓得什么的原因，总是希望评十个经济发展最好的大公司，八个最有影响力的媒体这些东西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所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，绝对不是媒体知识分子，不是媒体塑造的。媒体塑造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叫“名嘴”。他们影响大，但是他们很多人根本不具公共性——知识分子必须有公共性。他们也不是公众知识分子，公共和公众不同。比如有很多人写小说写得好，演电影，戏曲演得好，他们有公众性。公共是很严肃的，比如哈贝马斯说的“公共空间”。事实上公共观念绝对和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，公民社会的出现，就有了公共的事务，公共的观念，公共的领域。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，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，对其文化认同，对国家的发展策略，发展背景，各方面都有很强的感受。我最早写一篇很短的论文，叫《人文学与公共知识分子》，我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。我觉得西方对公共知识分子理解的资源很不够。西方对公共知识分子理解的资源，又不是希腊哲学家，又不是希伯来的先知，也不是基督教的牧师神父，也不是一般的出家人，他是入世的，但是他又有批判精神，后来人们把公共知识分子的起源归结到是俄国的知识阶层，也就是 intellectual，但是西方又跟俄国的不同，因为俄国的知识分子一定反政府，一定反体制，一定在体制之外。在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，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，在不同的各个领域起作用，在政府、媒体、企业各种不同的单位起作用。所以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与俄国是不同的。

陈璧生：蒙您的应允，《原道》第九辑把您列为顾问，我们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。作为我们刊物的顾问，您对《原道》有什么希望？

杜维明教授：就像你讲的，《原道》已经发展了十年，在当代中国的这种状况下能够维持十年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平常百分之八九十的杂志维持两三年都不容易了。海外我参加了很多，我参加的百分之九十都不能维持两三年以上，所以能够有十年的坚持就很了不起了，这是难得的积累。

陈璧生：由于《原道》是体制之外的，因此《原道》与陈明本人在这十年的发展中也碰到不少的挫折。

杜维明教授：我知道。《原道》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学派的碰撞，有自由主义的，新左派的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健康的。我们现在希望有一个平台，确实重要的观点都可以讨论。怕的就是不同的学派，在不同的平台发言，没有真正的交锋，如果有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交锋，那么各种不同的观点就可以在这里碰撞，可以有观点的创新。这对积累社会资本，培养文化能力乃至提升伦理智慧的贡献很大。现在除了经济资本以外，一定要储备社会资本，重视杂志、报刊、学术论坛这些不能量化的东西。同时除了智商，要培养伦理智慧，说是“情商”也可以。因为儒家有身心性命的传统。

我有一个忧虑，我发现人文学本身，包括儒学，内耗太厉害了。这是不必要的。内耗有很多原因，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、人文科学边缘化了，本来就没有什么资源，因此夺取资源的时候更在意这些有限的资源。而且，人文学的气魄不够壮，不能跟自然科学、经济、企业管理这些掌握大资源的领域对话，反而在自己内部，在极少的资源中进行完全不必要的内耗，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危险。我希望《原道》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气魄，不要变成一个狭隘的，极少数人的同仁杂志，而是提供一个各种重要观点讨论的平台。

陈璧生：谢谢您！